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light gray with a complex, abstract pattern. It features a series of thin, dark lines radiating from the bottom center towards the top corners, creating a sense of movement and depth. In the upper right and lower right corners, there are clusters of dark gray circles and crosses of varying sizes, some overlapping the radiating lines.

中国现代史

(中)

编者董原

目 录

北洋军阀势力的演变 国民革命运动高潮的掀起	1
张冯吴孙各派势力的演变 反奉倒段斗争和三一八惨案	1
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同国民党 右派及国家主义派的 斗争	8
北伐战争 国民革命的失败	25
北伐的胜利进军 奉系军阀在北方的黑暗统治	25
反帝运动和工农运动的大发展	36
国内外反革命势力的新勾结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46
武汉政府走向反动陈独秀 右倾机会主义的严重危 害 国民革命的失败	57
国民党在全国反动统治的建立 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割据	73
国民党在全国反动统治的建立	73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地武装起义 工农武装割据的开 端	83
国民党军阀的大规模混战	105
全国各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土地革命和红军反“围剿”战 争	113

北洋军阀势力的演变 国民革命运动高潮的掀起

张冯吴孙各派势力的演变 反奉倒段斗争和三一八

惨案

一 吴佩孚再起 孙传芳控制东南五省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初，吴佩孚兵败南下。十一月中到达汉口后，他以直系各省军阀的名义发表通电，宣布组织护宪军政府，由这个政府代表中华民国执行对内对外一切政务。但直系各将领并不赞成吴的这个主张，因此所谓护宪军政府并未组织起来。一九二五年内，吴佩孚逐渐控制了湖北，并于十月二十一日在汉口宣布成立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部，自立为总司令。他在武汉搜刮财富，招兵买马，并取得若干军阀的支持，又成为当时最大的军阀之一。吴佩孚的“讨贼”本意是要联奉反冯反段，但握有实力的直系将领孙传芳、萧耀南等则主张反奉联冯拥段，吴只得把“讨贼”的矛头首先指向奉张。

在吴佩孚组织十四省讨贼联军的同时，孙传芳控制了东南五省。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奉军源源开往上海，这引起浙江军务督办孙传芳和直系其他军阀的恐慌和反对，并且促成了孙传芳与冯玉祥的联合。一九二五年十月十五日，孙传芳以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名义通电讨奉。十六日孙军占领上海，十九日占领南京，二十三日占领蚌埠，十一月八日占领徐州。奉军退至山东

境内。孙传芳任命了苏、浙、闽、皖、赣五省的文武官员。这五省本列名于吴佩孚十四省联军之内，至此已为孙传芳所控制。孙也不再听命于吴，而独树一帜了。

二 郭松龄的倒戈和失败 吴张的结合

在奉军被孙传芳赶出苏皖两省后不久，奉军内部发生了郭松龄倒戈事件。

第二次直奉战争时，张学良任奉军精锐第三军军长。郭松龄任副军长。战后郭受张委托组织第三方面军，任第十军军长，并在张不在时可全权指挥整个第三方面军。奉军内部原存在新老两派的对立，新派中又分土洋两派。出身于陆军大学和保定军官学校的郭松龄、李景林（土派）与出身于日本士官学校的杨宇霆、姜登选（洋派）矛盾甚深。第二次直奉战争后，郭松龄对张作霖派奉军大举入关抢夺地盘，积极准备进攻国民军，十分不满。他曾提出罢兵息争，退兵关外，保境安民，开发东北的建议，未被张作霖采纳。又加第二次直奉战争后杨宇霆、姜登选、张宗昌、李景林等皆得一省地盘，而在战争中出力甚大的郭松龄，却一无所得。于是郭决心推倒张作霖，清除杨宇霆。一九二五年下半年，郭松龄与冯玉祥逐渐结合起来，十一月订立郭冯密约。再加李景林，形成反对张作霖的“三角同盟”。

十一月二十三日，郭松龄宣布班师回奉，要求张作霖下野，查办杨宇霆，拥护张学良为总司令。二十五日，郭率所部七万余人由滦州向山海关进发。二十七日占领山海关。十二月六日攻占锦州。奉军全线溃败。十二月二十日郭军占领新民，只距沈阳一百余华里。这时张作霖在东北的统治已岌岌可危。但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李景林的中途变卦重新归张，郭军最后遭

到了失败。十二月下旬经巨流河一战，郭军大败。郭本人被杀。

郭松龄事件后，冯玉祥、张作霖、吴佩孚三者的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冯玉祥国民军在郭松龄举兵后进占热河，同时向李景林提出假道出关援郭的要求，李不允。冯军继续进兵，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下旬攻占天津。李军退往山东，与张宗昌结成直鲁联军。冯玉祥有意联吴制奉，但吴佩孚不忘旧仇，拒绝联合。郭松龄失败后，吴口中的“贼”便由张作霖转为冯玉祥。他打电报给张作霖，表示愿与张联合讨冯。一九二六年一月初，张复电表示谅解。于是形成奉直两系联合进攻国民军的形势。冯玉祥在局势不利的情况下，宣布下野，随后把军队和地盘交给下属，自己准备到苏联去考察。吴张共同决定：吴军由京汉线北上；直鲁联军由津浦线北上；奉军负责关外（指西北）；奉张助吴军饷二百万元；北京政局将来由吴主持。接着，奉军、直军、直鲁联军向国民军发动了进攻。

三 反奉倒段斗争和“首都革命”

北京政变后，段祺瑞与张作霖结合，掌握了北京政府。他们对内破坏国民会议运动，镇压人民革命斗争，对外向帝国主义屈辱妥协，同全国人民的矛盾极其尖锐。

一九二五年四月，段祺瑞政府与法国订立《中法协定》，承认了争执几年的金法郎案，答应一九二二年法国政府提出的中国对法庚子赔款用金法郎计算的办法，使中国多付关银六千二百余万两。金法郎案遭到全国一致反对。

一九二五年十月爆发的孙传芳与奉系的战争，是军阀间的混战。但是反奉却是全国的普遍要求。中国共产

党决定趁机将反奉倒段斗争推向高潮。十月二十日，共产党中央和共青团中央联合发表《对反奉战争宣言》，号召全国爱国的民众“站在反奉运动之主体的地位”，积极参加反奉战争。宣言提出反奉战争的目的是“直到召集真正代表人民的国民会议，建立革命统一的民主政府，宣布关税自主，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十月二十四日，国民党中央也发表号召民众参加反奉战争的《对时局宣言》。

十月二十六日，各帝国主义国家为缓和“五卅”以来中国人民强烈的反帝情绪，派代表参加了由段祺瑞政府召集的关税特别会议。但是帝国主义并不允许中国实行关税自主。段祺瑞政府也根本无意力争关税自主，只是希望提高一点税率，以减轻日益加剧的财政危机。中国人民坚决反对这个会议，掀起了争取关税自主的运动。十一月十日，全国学生总会和广州外交代表团等团体在北京组织关税自主示威运动筹备会。筹备会组织了示威运动，电令段祺瑞“下野出京”。二十二日，北京各界举行关税自主民众大会，到数万人，群众高呼“反对欺骗中国的关税会议”、“打倒媚外政府”、“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各地商会也纷纷通电反对关税会议。

关税自主运动是反帝国主义运动，也是反奉倒段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以李大钊为首的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了这个运动。郭松龄事件后，北方区委决定展开更大规模的群众斗争，推倒段祺瑞政府，建立国民政府。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也决定：十一月二十八日开群众大会，压迫段祺瑞辞职，组织国民行政委员会。“首都革命”的斗争高潮由此掀起。

在五卅运动期间，北京大学学生就在共产党领导下

组织了学生军，以作为“以革命手段打倒帝国主义之准备”。以后又在学生军的基础上组织了北京革命学生敢死队，在工人中组织了工人保卫队。二十八日下午，各学校、各工厂的学生敢死队、工人保卫队和广大群众共五万多人齐集神武门前，举行示威大会。会后，群众高喊着“打倒奉系军阀”、“打倒段祺瑞卖国政府”、“建设国民政府”等口号，包围了执政府。后又捣毁了章士钊、梁鸿志等人住宅和《晨报》馆。由于运动的领导者和广大群众都缺乏经验，反动政府事先已有防备，原已联系好的国民军没有采取一致行动，这次打倒段政府的斗争没有成功。这次斗争是企图通过城市暴动夺取政权的一次英勇的尝试。

次日（二十九日），更多的群众在天安门前举行国民大会。大会通过了包括“即日解除段祺瑞一切政权，由国民裁判”；“解散关税会议，宣布关税自主”；“组织国民政府临时委员会，召开国民会议”等内容的决议案。连续的大规模的群众示威运动，形成“五四”以来北京革命斗争的一次高潮。

以北京的斗争为起点，上海、开封、汉口、广州等全国各地，都发动了要求打倒段祺瑞政府，建立革命的民众政权的斗争。

四 三一八惨案 国民军退往西北

一九二六年春，北方出现了反动势力联合向进步势力进攻的局面。一方面，奉军、直军、直鲁军联合向国民军发动进攻；一方面段祺瑞政府对北方人民革命运动进行残酷镇压。

一月中旬，奉军入关进攻国民军，国民军退守滦州。同月，直鲁军向进入鲁西的国民二军岳维峻部和新附冯

玉祥的方振武部发起攻击。方部退往大名，岳部退回河南。二月，直鲁军由山东攻入直隶，直军与国民军大战于河南。月底，直军占开封，三月间占郑州、洛阳、信阳等地。河南的国民军一部溃散，一部为吴佩孚收编，一部退入陕西。同时，陕西刘镇华、山西阎锡山配合吴佩孚的攻势，分别出兵占领潼关、石家庄。形势对国民军十分不利。

三月八日，奉军兵舰由大沽口袭北塘，被国民军击退。国民军为阻止直鲁军继续用军舰运兵运械，封锁了大沽口，规定任何舰只不许开入，外国船舰亦须白天行驶和经过严密检查。但日本帝国主义在十二日继续用驱逐舰掩护奉舰两艘驶入大沽口，并炮击大沽口炮台。国民军奋起反击，将日舰逐走。十六日，日本帝国主义纠合英美法意等八国公使，以维护辛丑条约为由，向段祺瑞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提出北京至海口的交通不得发生任何障碍、奉国两军即刻停止在大沽口附近作战、国民军完全撤除海上水雷等五项要求，限十八日正午以前答复。同时，各帝国主义军舰二十余艘群集大沽口。很显然，这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武力恫吓，也是日本帝国主义援助奉军的具体行动。

大沽口事件和帝国主义的通牒激怒了中国人民。三月十七日，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北京学生总会、北京总工会等发起召开北京各学校、各团体代表紧急会议，议决五条：严正驳覆通牒、不许日舰携带奉舰入口、驱逐八国公使出京、请国民军为废除不平等条约而战、三月十八日在天安门前召开国民大会。十八日，反对八国通牒国民示威大会准时召开。与会者三万余人，徐谦、李大钊等为大会主席。李大钊在演说中号召群众不分界

限地联合起来，用“五四”的精神、“五卅”的热血，反抗帝国主义的联合进攻，反对军阀的卖国行为。大会通过决议：废除辛丑条约及一切不平等条约，立刻撤退在津及各地的外兵外舰，惩办大沽口战争祸首等。会后组织两千多人的请愿团，由李大钊等带领赴铁狮子胡同执政府和国务院请愿。请愿队伍到后不久，府院卫队即奉命展开大屠杀。一时间，枪弹、铁棍、大刀一齐向手无寸铁的群众袭来。群众死者四十七人，伤一百余人。这就是三一八惨案。惨案发生后，段祺瑞政府反诬群众的爱国举动是共产党“聚众谋乱，危害国家”，下令通缉共产党人李大钊和国民党人徐谦等。段政府从此人心丧尽。

三一八惨案用血的事实教育了中国人民，使广大群众更加认清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和军阀政府的罪恶。三月二十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段祺瑞屠杀人民告全国民众书》，揭露段是“彰明较著的卖国凶犯”，号召民众起来革命。上海、天津、广州、桂林、长沙、南昌等地的群众以及海外的华侨和留学生，纷纷举行各种活动，声讨卖国政府，声援北京人民，形成一次广泛的群众革命运动。

三一八惨案后，国奉战争继续进行。三月间，奉军攻占滦州、唐山，直鲁军进占天津、丰台。四月，奉军汤玉麟部占领热河，国民军宋哲元部退往张家口。四月十日，驻北京的国民军鹿钟麟部驱逐了段祺瑞，推倒了段政府，同时恢复了曹锟的自由。鹿欲联吴抗奉，但为吴所拒绝。四月十五日，国民军由北京退往南口。下旬，直鲁军进入北京。后国民军又放弃南口、张家口，向西退到绥远、甘肃。在奉直两系的镇压下，北方革命运动转入低潮。

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同国民党 右派及国家主义派的斗争

一 国民党左中右三派的分化 廖仲恺被刺

国民党自改组以后，由于许多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的加入，组织有很大发展，力量有很大加强。但是，在改组后的国民党内，仍然保留有地主、买办分子和军阀、政客，他们是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反对者。这时国民党的主体，依然是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既有反帝反军阀的一致方面，又有经济政治利益相冲突的一面。既然“国民党本是各阶级联合组织的政党”，“各阶级底经济背景不同，故其阶级性也必然不同，所以党内分出派别，是必然的现象”。

对于国民党的这种分化，《向导》、《中国青年》等刊物及共产党的会议文件中，曾多次论及。一九二四年九月十日出版的《向导》第八十二期发表的《国民党右派反革命的经济基础》一文，分析了左中右三派的阶级属性：“左派是代表工人、手工业者、农民和一部分小商人与知识阶级。这是真正的革命派。中派代表工商业者和一部分小资产阶级。这是妥协派。右派则代表一部分与帝国主义有关系的大商人——如华侨、地主、军人、政客、洋行买办等。这完全是反革命派”。这种划分基本是正确的。但把华侨和军人笼统地归入右派是错误的。同时三派中的分子也是有变动的，一些被视作中派甚至左派的人物，后不久就变成了新右派。

左派与右派的分歧，主要表现在赞成还是反对反帝反军阀的政治主张、赞成还是反对孙中山三大政策两个

问题上。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右派之间，除了一般左右派的分歧以外，还突出地存在着由谁掌握革命领导权的斗争。这种斗争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共产党力量的壮大，越来越尖锐。

一九二四年夏，发生关于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党团”问题的争论。六月，邓泽如、张继、谢持三人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身份，向孙中山和国民党中央提出《弹劾共产党案》。他们“弹劾”的理由，就是发现了一九二三年八月印发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会议决案及宣言》、一九二四年四月印发的团刊第七号。这两份材料包含有中共“三大”《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决议案》和青年团的相应决议等文件。这些文件中写有青年团“应努力协助中国共产党，‘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团要接受共产党的“种种指挥”；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对国民党的各种工作要做“一致努力”；在发展国民党组织的同时，共产党组织的发展“当然不能停止”等内容。据此，他们便认定共产党“实以共产党党团在本党中活动”，是“党中有党”，是“违反党义，破坏党德”，对国民党的生存发展，“有重大妨害”，要求“从速严肃处理”。他们要求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取下“共产党招牌”，否则“不如分道扬镳”。这是对共产党的攻击和恫吓，是对孙中山联共政策的破坏。

邓泽如等人的进攻，受到共产党方面的反击。陈独秀、恽代英等著文逐点驳斥了他们的谬论，指出这场争论“实在是国民党左派与右派之争，也就是国民党内革命派与不革命派之争”。国民党中央也否定了他们的弹劾案。国民党中央先是在七月发表《关于党务宣言》，接着在八月一届二中全会做出决议，指出：“本党既负有中国

革命之使命，即有集中全国革命分子之必要”。“凡属一切真正的革命分子，不问其阶级的属性为何，吾党皆应集中而包括之”。“对于加入本党之共产主义者，只能问其行动是否合于国民党主义政纲，而不问其他”。

这场争论，虽然是围绕所谓“党团”问题进行的，但实际上是要不要国共合作的斗争。张继、谢持一些人不服从国民党中央的决议，继续坚持反共立场，不久就走向公开的分裂。

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同右派的尖锐斗争中，一九二五年八月发生廖仲恺被刺事件。

廖仲恺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著名政治活动家，坚定的国民党左派。他积极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坚决拥护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国民党改组后，担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工人部长、黄埔军校党代表、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等重要职务。他为实现国共合作、建立黄埔军校、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大贡献。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称他为“无产阶级的好朋友”。因此他就成了帝国主义分子和国民党右派集中仇恨的目标。从一九二五年七月初起，一些右派分子多次召开会议，密谋反对廖仲恺。八月二十日，廖被刺牺牲。

刺杀廖仲恺，这是国民党右派打击左派、反对国共合作的一个重要举动。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中央吊唁廖仲恺遇刺，指出反革命派刺廖的目的，是要“推翻国民政府，颠覆为民族民众利益而奋斗的政府”。唁电希望“用果决奋勇的精神扑灭反革命派，努力与帝国主义者奋斗，巩固国民革命的势力”。廖被刺后，设立了审理廖案特别法庭，逮捕了廖案嫌疑人犯。

在处理廖案过程中，一方面打击了右派势力，但另一方面却让蒋介石乘机夺取了广东的军政实权。廖案发生的当天，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决定由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组织特别委员会，授以政治军事及警察全权，应付时局。八月二十四日，蒋担任广州卫戍司令。二十六日，国民政府编组国民革命军，蒋又担任了第一军军长。同时，他利用革命派对右派的愤恨情绪，借追查廖案的机会，把与廖案有牵连的地位比他高的胡汉民（国民政府外交部长，曾代理大元帅兼广东省长）和许崇智（军政部长兼粤军司令）排挤出广州。蒋介石在国民党中的地位大大提高了。

二 戴季陶主义的出现和反对戴季陶主义的斗争

戴季陶是国民党新右派的重要理论家。他对孙中山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一开始就表示反对，曾同积极拥护三大政策的廖仲恺“争论累日”。国民党“一大”后，他狂妄地要求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取消共产党党籍，做一个“纯粹”的国民党员。孙中山逝世后，他的活动更加猖狂起来。一九二五年三、四月间，他在北京、广州到处讲演，歪曲孙中山学说，反对阶级斗争和国共合作。五卅运动前夕，他在国民党三中全会上，极力主张确定国民党的“最高原则”，即以他所歪曲的三民主义作为中国革命的中心思想。五卅运动的风暴，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能力，这就更加引起一切反动势力对共产党的忌恨和仇视。革命统一战线中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日益尖锐起来。一九二五年六、七月份，戴季陶相继写成《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小册子，提出一套反动理论，对

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对革命统一战线和中国革命运动进行攻击。这标志着戴季陶主义的形成。

戴季陶用儒家的所谓“仁爱”说解释孙中山的思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他说三民主义的“思想基础”是“民生哲学”，仁爱又是“民生哲学之基础”。孙中山的思想“完全是中国的正统思想，就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他说中国“没有显明的强大的阶级区分”，“革命与反革命势力的对立，是觉悟者与不觉悟者的对立，不是阶级的对立”。治者阶级、资本阶级、地主阶级“觉悟了”，就可以为被治者阶级、劳动阶级、农民阶级“来革命”。因此“拥护工农群众的利益，不需要取阶级斗争的形式，……可以仁爱之心感动资本家，使之尊重工农群众的利益”。戴季陶还把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对立起来，用民族斗争否定阶级斗争。他攻击共产党是“争得一个唯物史观，打破了一个国民革命”。戴季陶反对阶级斗争，实际上正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烟幕。

戴季陶提出必须以他所解释的三民主义即戴季陶主义作为统一战线“共信”的基础，否则，“共信不立，互信不生；互信不生，团结不固；团结不固，不能生存”。他鼓吹团体的“排拒性”，召唤“真实的三民主义信徒，很勇猛精进的团结起来”，对于互相间没有“共信”的共产党人，发挥国民党的“独占性、排他性、统一性、支配性”。或者是共产党员“脱离一切党派，作单纯的国民党员”；或者是把共产党从国民党中排斥出去。

戴季陶的谬论以“中正”的面孔出现。他说三民主义是一种“温和中庸”、“和平中正”的主义。它既反对布尔什维主义，又反对泛系主义（按即法西斯主义）。这

也就是他的信徒所说的“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但实际上他攻击的真正对象是共产党。

戴季陶主义出现后，曾广泛传播，成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反共篡权的理论基础。

中国共产党对戴季陶的进攻，给了严厉的回击。

共产党人驳斥了戴季陶要求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放弃阶级斗争的谬论，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他们指出：共产党不但不否认民族斗争，而且认为当前的民族斗争非常需要。但是承认民族斗争，并不能否认阶级斗争。若因为要完成国家和民族的需要，便抹煞阶级斗争的需要，那就是一个极大的错误。这种错误观念，不但抹煞了阶级的利益，而且会使民族斗争之进行受极大的损失。“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之成功，当以工农群众的力量之发展与集中为正比例；而工农群众的力量，又只有由其切身利益而从事阶级的组织与争斗，才能够发展与集中。因此，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主张停止阶级争斗，便是破坏民族争斗之主要的力量”。所谓“纯正的三民主义者”，专以反对阶级斗争为宗旨，撇开大多数农工民众利益而说什么国家民族利益；实际上便是资产阶级蒙蔽愚弄农工阶级的政策”。

共产党人揭露了戴季陶关于仁爱的骗人说教，指出它完全是欺骗工农的鬼话，历史上从来没有资本家对工人、地主对佃农有仁爱之心的。戴季陶的这种谬论，“是要想暗示农工民众停止自己的斗争，听凭上等阶级的恩命和指使，简单些说，便是上等阶级要利用工农群众的力量来达他们的目的，却不准农工群众自己有阶级的觉悟”。“戴季陶虽然理论上反对阶级斗争，主张资本

家的仁慈主义，然而他在实践方面——发行那《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的小册子，自己就实行思想上的阶级斗争，不过是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的一种斗争罢了”。

共产党人批判了戴季陶反对国共合作的谬论。指出：戴季陶所说的团体有“排拒性”，不过是资产阶级排拒无产阶级而已。戴的所谓“共信不立”，也是站不住脚的。国共合作后的国民党是有共信的，这个共信就是“对外谋民族解放，对内谋政治自由，换句话说，就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当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理论观点是不同的。“无产阶级的阶级争斗说若不能做国民党的共信，资产阶级的劳资调协说也不能做国民党的共信，因为国民党不是一阶级的党”。中国国民党既非一个阶级的政党，而是各阶级联合的政党，“那么，于共信（即共同利害所产生的政治理想共同点）之外，便应该有别信（即各别阶级利害所产生的政治理想各别点）存在”。

总之，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只有两条路：一条路是注重工农阶级的阶级斗争，以无产阶级引导一切革命阶级前进；另一条路是侧重资产阶级的利益，讲“中庸”、“调和”、“统一”而反对阶级斗争，其结果是为买办阶级的力量所利用，完全到右派及帝国主义一方面去。

中国共产党对戴季陶主义的批判，取得很大的成绩。如戴自己所供认的，他的小册子一出版，立即受到“很大的攻击”。不但共产党人，而且许多国民党人，都一致对他的小册子“下总攻击”。在批判的攻势下，他的同伙，“一半是忍泪吞声，一半是委曲求全”。革命舆论压倒了反革命叫嚣。

共产党人和革命分子同国民党右派斗争十分尖锐的一个地方是黄埔军校。

一九二四年秋广州商团叛乱期间，黄埔军校第一期部分学生，联合驻广州的湘粤桂等各军校学生，成立了青年军人代表会。一九二五年二月，在共产党的支持下，青年军人代表会改组为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主要负责人有李之龙、蒋先云、周逸群（都是共产党员）等。为加强国共合作，该会规定凡是黄埔军校学生，都是该会会员。它还在驻广东的各军中发展组织，出版《中国军人》和《青年军人联合会周刊》等刊物。联合会确定从事三方面的工作：发动一切被压迫的民众，向帝国主义和军阀进攻；深入士兵群众，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努力同工农群众结合，结成严密的联合战线。联合会是当时广东有名的革命组织，会员曾发展到二万多人，在平定杨刘、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

为了阻挡共产党力量的发展，同青年军人联合会对抗，一九二五年初，黄埔军校的右派分子贺衷寒、缪斌等开始酝酿成立孙文主义学会，年底正式成立。学会分子以黄埔军校和中山大学为主要活动地点，以戴季陶所解释的孙文主义为理论基础。他们专门监视军校中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的活动，甚至偷窃共产党员的文件，常常借故向青年军人联合会会员寻衅。他们出版刊物《国民革命》、《孙文主义丛刊》等，进行反动宣传。它虽然也打着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招牌，但实际上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反动团体。除广州外，在上海、北京、湖南等地也出现过名称和宗旨相同的孙文主义学会组织。

一九二六年春，蒋介石利用右派军官和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发动了中山舰反革命事件。事件后，青年军人联合会被迫于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五日宣布解散。孙文主义